

《现代传播学》丛书

◎ 金兼斌

技术传播

创新扩散的观点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526578



526578

技术传播

——创新扩散的观点

金兼



713712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久军 王桂芝
封面设计:孙汇峰

技术传播——创新扩散的观点
金兼斌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6 12/16
字数:150 000
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 7-207-04625-1/C·149 定价:12.00元

《现代传播学》丛书编委会

策划 刘 双

主编 刘 双

编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肖小穗 李 萍

金兼斌 教军章

序

北京人有个俚语叫“坎”，四川人叫它做“摆龙门阵”，香港人叫它为“八卦”，台湾人则说“盖”。其实，不管叫什么，它们和传播都分不开。学历史的人说人是历史的动物，学政治的人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学心理的人当然说人是心理的动物，而学社会学的人则说人是社会的动物。其实，历史、政治、心理、社会，都离不开传播。历史是和前人传播，政治是沟通，心理是自己和自己传，而社会则是与人传。

人当然是传播的动物，他一生下来就用“哭”来向世界报到，在学会语言与文字之前，“哭”、“笑”是重要的传播工具。婴儿虽小，但其掌握“哭”、“笑”的本领，绝非成年人可及，不加研究，还不知所哭与所笑为何呢。

有人类就有传播，但有人类却未必就有传播研究。传播研究是人类社会演进、复杂化的必然结果。语言与文字的出现便是研究的成果，难怪有西方学者要将传播学溯源至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罗马帝国的西塞罗。中国学者也不示弱，他们说，鬼谷子、苏秦、张仪、孔子、荀子、孟子等都曾对传播提出高见。这些学者所言不差，但高见并不等于有系统的科学分析与研究。真正系统地探索传播的复杂问题应是在本世纪，说“紧”一点，充其量也不过 50 年。

科技带来希望，也带来恐惧。印刷术、无线电广播、电影、电视、传播卫星、电脑，以至现在几乎无所不在的因特网(Internet)，在不同阶段给我们带来了憧憬，但也给我们带来了迷茫。化憧憬为现实和破除迷茫并无捷径，惟认识与了解是途径。认识与了解就

是传播研究。

1949年应是中国传播研究的分水岭。之前,军阀混战、对日抗战、内战,社会学、心理学都刚刚开始,更莫说传播研究了。其实传播学这个名词根本不存在,1949年以前,我们有的只是以报史为核心的办报之学。1949年后,新闻学仍然当道,编、采之道与宣传之方是钻研的主题。这在大陆、台湾和香港两岸三地都是如此。传播学进入台湾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到如今已有40年的历史。台湾对传播学固然是一开始就拥抱,但真正的发展也是由工具性的研究转为包括批判性分析在内的多方研究。此外,传播学的初始是大众传播,而少谈人际与文化传播,后者是90年代后才兴起的。传播学在台湾的发展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前20年是奠基,接着的10年是发展,到了近10年才放光彩,这和台湾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变迁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香港,传播学的起步与发展大概晚了台湾10年,在50年代,只有办报杂忆,系统论述是60年代中香港中文大学成立后的事。不过,科研虽有小成,但却是来自美国的“外籍兵团”的成绩,真正本土的研究则是70年代后期的事。香港腹地太小,虽然经济发达,但政治大局动荡,过客型的研究,加上科研人数太少,虽有成效但总的数量则有限。90年代,情况改善,但大致上变动也不大。以内涵言,香港的传播研究和台湾的分别不大,发展的分期也相似,这可能同两地来往较多,而且教研人员多为留美及留英者有关。

在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起步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之前,也只是新闻与办报之术,“学”味不浓。文革时期,则更不用提矣。改革开放引进的不只是经济与管理方式,新的学术与思潮也进来了,传播也就在这时进入了大陆。不过,前10年它的际遇不

佳，“半信半疑，半推半就”是其写照。90年代，传播学的“命”好了不少，加之市场经济的迅速推进，使广告与公关开启了传播学的大门，虽然传播研究仍是工具性多于纯学术性的钻研。

严格说来，在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是大众传播多于人际、文化传播，引介多于科研。两种类型的学者构成了传播研究的骨干，一类是新闻学系的教授，他们的重点是新闻、公关、广告；另一类是英语语言文学系的教授，他们关心的是跨文化传播的问题。在这些基础上，大家对市场与管理也有共同兴趣，于是乃有人际传播、组织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的研究。

不必讳言，传播研究是舶来品，但我们不必，也不应该让它永远停留在“洋货”的阶段，而应使它在中国的土壤上“化”成国货。“化”的过程不会短，但第一步必须是全面而批判地引介和分析。过去，这个工作多限于大众传播方面，90年代后期，跨文化传播的引介多了，这是好现象。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我们所做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现代传播学》丛书的编写是传播学在中国生根的重要里程碑，它谈操作与实际，但它以理论为依据，有系统，有分析，这是它和只偏重理论的“玄谈”之著的最大分别。传播学的健康成长是需要实际与理论并重的。

《现代传播学》丛书的作者都相当年轻，在30岁到40岁之间，分别来自语言、哲学、管理、传播等不同学科，他们体现了传播学跨学科的本质，也丰富了我们传播现象的多方位认识。他们是中国大陆传播学的现在，他们更是中国大陆传播学的未来！传播学是门年轻的学科，它在中国的土壤上就更年轻，它园地广阔，愈多人灌施肥愈好。这套丛书的贡献肯定是深远的，中国传播学的未来在这些年轻学者的身上，更在他们的学生身上！

改革与开放促进了传播，而传播也促进了改革与开放。在这

个连绵不断的过程中,在起始阶段,“摸着石头过河”是可以理解的,但之后就得有通盘的认识与分析了。传播学研究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可以肯定它能协助我们思考与化解问题。

老子说:“上士闻道,勤而习之。”传播是现代之道,除了“勤而习之”外,我们别无它途。基于此,我们欢迎《现代传播学》丛书的出版!

朱 立

1999年12月5日

于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

前 言

传播学研究在西方已有几十年的历史,累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研究对象广及社会和文化的各个领域。随着技术和文明的不断进步,作为人类最基本的一种存在活动,传播对于社会发展和人类生存的重要性正与日俱增。传播为我们理解世界提供了一种视角。

技术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源泉,它本身已经成为现代文化的重要部分。技术曾经是人类挑战自然并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的一张骄傲的王牌。今天,在世纪之交,在又一个千年无声无息如期而至之时,技术对于人类和社会的意义变得更为意味深长。正如技术学家 E·舒尔曼所说,技术已成为一种无所不在、动荡不居的力量,影响着人类的历史。

本书试图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把技术和传播这两者结合起来。我们将从传播学的角度对于技术在社会中的传播和扩散现象进行研究。这是具有巨大学术挑战性和现实重要性的一种研究。在今天,我们社会和生活的各个方面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地依赖于各种技术的力量;而技术要发挥其威力,有赖于其被有效地传播和扩散。

技术传播是一个颇为笼统的指称,因此,在本书的开头,我们以绪论的形式对技术传播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的研究方向作了综

述,旨在对技术传播的各种理解和相应研究作一全景式的梳理,并对本书的内容作一定位。简单说来,本书是用创新扩散的观点来讨论技术传播现象。在本书中,我们首先讨论了技术传播的不同模式,指出了两种最基本的技术传播的模式,即点对点的技术转让模式和点对多的扩散模式。这种分析的重要性在于它使我们对于所分析的技术传播现象的本质有较高层次的把握。

从第二章起到第六章,我们主要以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的有关论述为基础来讨论创新在一个社会系统中的扩散现象。作为创新扩散研究的集大成者,罗杰斯对创新扩散研究的各个方面作了详细的总结。本书上述章节基本上以他的论述为框架展开。通过补充最新的或者为罗杰斯所忽视的研究成果,我们对有关内容在取舍之余作了重新演绎。我们希望在有限的篇幅内能触及几十年创新扩散研究的主要成果。

本书主要论述的是个体层面的创新采用过程,以此为基础再来讨论创新在一个社会系统中的扩散。第七章与前五章不同,它主要讨论的是组织中的创新扩散和创新过程。组织中的创新过程研究是最近20年间逐渐受到重视和关注的研究领域。由于组织特别是企业对于现代社会的特殊重要性,组织的技术引进和创新采用研究吸引了众多领域的专家学者。本章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探讨了组织中的创新过程之有关研究。

本书最后一章我们向读者介绍了一个个体层面的创新采用决策模型。由于创新的扩散有赖于个体的创新采用,而采用决策又是整个采用过程中的关键一环,因此,创新采用的决策机制值得我们作深入探讨。由于传统创新扩散研究较少关注这个角度,我们的模型建构基础是行为科学研究中的理性行为理论。通过创新采用过程模型和理性行为理论的有机结合,我们构建出一个用以分

析和理解个体层面的创新采用的决策模型。我们对于模型的应用也作了示范性说明。

总之,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我们的视野越来越具体、微观。第一章基本上是对整个技术传播现象的一种抽象概括;从第二章到第六章,虽然我们主要进行个体层面的创新采用分析,我们也进行系统层面的扩散分析,并且所用的方法基本上是定性分析为主;第七章是组织中的创新过程研究,内容相对具有独立性;而第八章则基本上集中在个体层面的微观分析,运用行为科学中的态度理论作为分析框架,遵循的完全是定量分析的研究典范。本书的这种结构安排和内容选裁蕴含着作者的一种基本理念,即定性和定量方法,宏观把握和微观深入,对于传播研究是相辅相成的。

有关技术传播的论著迄今在国内还所见无几。本书的资料基本上是这两年作者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接触和阅读的英文资料。本书本质上是一项编著工作,选取有关技术传播的前沿研究成果,并重新用作者的体系和语言加以规划和诠释。就技术传播的理论和概念而言,真正属于作者原创性的思想不多,更多的是一种注释和阐发以及在中国具体环境下的应用说明。由于成书较为仓促,本书很多观点和理解大有值得商榷之处。我们的初衷是启发国内学者对技术传播这一研究领域的关注,为他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观点和理论框架。我们认为在社会科学领域,任何的理论和观点的有效性都是相对的。希望读者在阅读时,以一种批判和辩证的眼光看待有关的论述,切忌绝对化。

对于参考文献的注解,除了各章中相应之处提供脚注外,还在书末提供了本书的主要参考资料目录。由于涉及大量的概念和名词的中译,我们采用的译名可能不尽合适。基本上,在中译名难以酌定时,我们会参考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所编译的《中译社会学

词集》中的有关译法,希望读者注意。有关外国学者的译名则以音译为主,在首次出现时注出其英文全名。本书是作者的第一本独立著述。感谢我的同学刘双博士对我的信赖和不懈鼓励、督促,一切从狮子山下同窗求学的生涯开始。感谢我的导师朱立教授和我担任其助教的肖小穗博士,他们允许我在时间安排和精力分配上作策略性调整,并鼓励和支持我的著述活动,使本书的成书成为可能。当然,本书的一切错漏,皆由作者自己负全责。

感谢出版社编辑对我的信任。虽然从未曾和他们见过面,但是他们的信赖却一直促使我在繁忙的学习之余对本书的写作不敢草率。

希望读者能从本书中发现一些对他们有用的新知识、新观点,启发他们的思考,开阔他们的观察视野。作者也诚恳希望得到各方面的批评和指教。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不知一次地产生一种强烈的无力感和惶恐感。迄今,惴惴之情,挥之不去!

金兼斌

1999年11月

于香港浸会大学吴多泰博士国际中心

目 录

序

前 言

绪 论..... (1)

- 第一节 科学与技术..... (1)
- 第二节 技术传播..... (3)
- 第三节 研究技术传播的重要意义
..... (15)

第一章 技术传播的不同模式

..... (19)

- 第一节 技术传播的不同阶段 ... (20)
- 第二节 技术传播的思想演变 ... (24)
- 第三节 技术传播的不同模式 ... (26)
- 第四节 技术开发与技术传播 ... (32)

第二章 创新扩散要素..... (38)

- 第一节 何谓扩散 (40)
- 第二节 创新扩散四要素 (41)

第三章 创新采用过程..... (56)

第一节	创新采用过程模型	(56)
第二节	创新采用过程	(61)
第三节	创新采用时间	(76)
第四章	创新特性分析	(80)
第一节	有关创新特性的研究 ..	(82)
第二节	创新特性分析	(85)
第五章	创新采用者分析	(102)
第一节	以创新精神为依据对 采用者归类	(102)
第二节	不同类别采用者分析	(113)
第三节	关于创新精神概念的 进一步探讨	(121)
第六章	创新扩散网络	(124)
第一节	意见领袖	(125)
第二节	扩散网络	(134)
第三节	临界数量	(141)
第七章	组织中的创新扩散 	(150)
第一节	组织创新过程的分阶段 模型	(151)
第二节	组织创新采用的社会市场 学观点	(159)
第三节	创新种类、创新激进行度 与组织创新采用	(166)

第八章 个体创新采用决策机制

..... (173)

第一节 态度行为理论 (174)

第二节 关于理性行为理论的
进一步讨论 (181)

第三节 一个个体层面的创新
采用决策模型 (191)

第四节 模型的应用说明 (194)

绪 论

在本书的开头,我们将对技术传播这一指称的涵盖范围及其各研究领域作一粗略梳理,并在这样的背景中定位我们的讨论主题和讨论方法。我们的讨论将从对科学和技术这两个既相关又不同的概念的理解开始。

第一节 科学与技术

科学和技术是两个不同而互有密切联系的概念。我们将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从不同的角度作一对比,但并不打算对这两个概念各自丰富的含义作全面的铺陈。

科学通常是一种探索未知、探寻知识和真理的活动,或所有这些活动成果的总和。在我们提到科学时,往往把它和另一个概念即基础研究联系在一起,如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其他基础学科的研究活动及成果。科学探索往往并不以非常明确具体的功利目的为起源;相反,科学作为人类不断向未知世界推进的“前沿”,科学探索本质上反映了人类的冒险精神、发现热情和高贵的进取心。与此相对应的是技术的概念。技术总是有目的性的。从古希腊时期起,在人们对技术的理性反思中,技术总是和“工具”的概念联系在一起,是人的自然能力的延伸。虽然技术本身常常被

认为是中性的,但技术的产生、演变、应用及其社会后果,从来就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技术是一种生产力,是人们面对自然、社会种种具体挑战时所拥有的“利器”,也是人们进一步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实现人类意愿的最有效手段。在科学发现向产生财富的商品和服务的转化过程中,技术通常起着关键性作用。

科学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现代技术社会的基石^①。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发展,许多新技术对于科学的依赖正在增加。越来越多地以科学为基础的工程学,如果没有科学知识作为基础,是无法达到现在这样的复杂程度的;另一方面,科学和技术的日益集成也产生了反作用:在科学拓宽了技术的视野和能力的同时,技术问题也正为重要科学领域提供灵感。^②

因此,科学和技术本质上是密切相关的,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受益。今天,科学和技术事业更像一个生态系统,而不是像一条生产线——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然后再发展成为产品;不是简单的技术建立在科学之上,而是科学和技术间的循环加速互动,日益相互依赖。一方面,科学知识只有通过工程学转化为成功的技术,才能够得到有效的扩展和应用。另一方面,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技术,那些改变我们生活、学习、工作、教育、休闲和娱乐方式的开创性技术,大多植根于基础研究的发现之中,因为“这样的发现使我们以全新的方式看待大自然的运行”^③。

科学和技术还具有文化上的含义。现代研究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对于我们生活的物质环境的改变,它还改变了我们对于我们自己和我们在宇宙中所处位置的观念,以及我们对于人类历史和人

① (美)W.J.克林顿、A.戈尔:《科学与国家利益》,曾国屏、王蒲生译。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6页。

② 同上,第32页。

③ 同上,第26页。